



乡村小学教室墙上的宗教标语

乌干达是东非内陆大湖地区一个面积不大的国家，它与非洲许多国家一样，曾历经战乱，命运多舛。非洲国家给人的印象通常是战乱、贫穷、落后，但最近二十年来，乌干达却维持了难得的和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许多人预言，如果乌干达能够继续保持稳定，这颗“非洲明珠”将会发出灿烂的光辉。

今年4月至7月，我有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委派，受香港“全球文明研究所”资助，远赴乌干达，前往这个气候宜人，美丽如画的东非小国考察宗教。

一、宗教历史的“非洲模板”

19世纪中叶之前，乌干达仍是一片封闭的荒野，黑人文明零星点缀着浓密的森林和广袤的草原。因为地处偏僻，外来的文明，包括宗教文明难以到达这片猛兽丛生，危机四伏的土地。黑人信仰自己的部落宗教，其中发展比较完善的宗教形态是乌干达南部（即布干达王国）的鲁巴里信仰，神像、神庙、祭司、仪式等一应俱全，布干达国王将鲁巴里信仰视为国家宗教，每年向鲁巴里神

庙赠送大量资产，主持重大宗教活动。国王每遇重大国事，都要向鲁巴里神庙咨询，然后再做决策。

1857年前后，外来宗教第一次到达乌干达南部，东非沿海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首先开拓一条连接沿海与内陆的道路，将黑人从未见过的新奇商品带来的同时，也带来了伊斯兰教。乌干达人第一次接触到世界性宗教的普世主义观念，相比于部落宗教的宗族观念而言，世界主义、天堂与地狱观念让黑人统治者惊讶不已，他们将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与他们的商品，火枪、刀剑、布匹、珠宝联系起来，认为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他们才有更先进的武器，更发达的文明。伊斯兰教是比鲁巴里信仰更先进的宗教。于是黑人统治阶级首先皈依伊斯兰教，国王学习阿拉伯语，能够背诵《古兰经》，并强迫臣民紧随其后。对拒绝伊斯兰教者格杀勿论。

大约10年后，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也在穆斯林的带领与帮助下，接踵而至。欧洲人又带来另一种普世性的基督宗教（天主教，新教）。黑人逐渐发现，原来阿拉伯人威力无比的火枪与火炮竟是基督徒所制造，基督徒能设计建造漂亮宏伟的别墅，能奇迹般让毁坏的火枪重上战场，欧洲人在技术上比阿拉伯人更为

先进，这是不是意味着基督宗教比伊斯兰教更高贵？选择伊斯兰教还是基督宗教？他们处在两难之中。深思熟虑之后，统治者选择一条最现实的策略：在两种外来宗教之中搞平衡，这样既能取得与穆斯林贸易的商业利益，又可以享受基督徒更先进的现代技术。国王随即又努力学习英语，竟然对《圣经》也谙熟于胸。于是，伊斯兰教与基督宗教都可以在乌干达境内传播。两大宗教逐渐走入并立局面，传统的鲁巴里信仰迅速没落。

令布干达人意料不到的是，随着基督宗教传教士而来的不仅仅是先进技术和更舒适的生活，英国大兵也紧随其后。殖民力量逐渐渗入到乌干达，黑人政权日益边缘化。以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为代表的力量开始瓜分土地，发动宗教战争，划分势力范围，以期各自分开居住，避免冲突。在英国殖民政权的支持下，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占据大部分土地，伊斯兰教只得到面积很小的三个行政区，许多穆斯林不得不寄人篱下，到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土地上居住。穆斯林在这次土地瓜分中败北，伊斯兰教彻底失去了在乌干达的优势地位，渐渐在该国宗教格局中居于配角，直到今日。

西方传教士的到来，终结了乌干达伊斯兰化的进程。这对中南非洲的宗教历史有标志性意义，东非沿海的穆斯林终止了西进南下的脚步，给西方传教士留下了活动空间，于是乌干达以西的刚果，以南的布隆迪、卢旺达、赞比亚都成了基督宗教的世界。

英国殖民期间，大批印裔英国士兵和印度商人来到乌干达，将印度教也带到这个东非高原国度。20世纪中叶，新兴宗教巴哈伊也来到乌干达寻找发展空间，此外还有犹太教等。乌干达的宗教信仰更加丰富多彩。

乌干达的宗教历史与撒哈拉以南国家的宗教历史有诸多相似性：先是本土宗教的自主发展，然后是伊斯兰教的到来，基督传教士又紧随其后，外来宗教渐居主导地位。甚至印度

教和巴哈伊教的入驻，在撒哈拉以南国家也具有普遍性。由于乌干达地处非洲中东部，它的宗教历史虽然不如它以北的萨瓦纳诸国那样具有较长的伊斯兰教历史，却都拥有一定数量穆斯林人口，同时又像它以西以南非洲诸国那样基督宗教居主导地位，因此综合起来，乌干达的宗教历史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中比较“中庸”，堪称非洲宗教历史的“模板”。

二、多种宗教并存，宗教气氛浓郁

乌干达是一个以基督宗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根据2002年乌干达人口普查，在2500万总人口中，全国基督宗教各派共占85.1%，其中天主教41.9%，新教徒35.9%，五旬节派4.6%，复临安息日派1.5%，其它各派占1%。穆斯林占总人口的12.1%。印度教徒占0.7%。此外，各部落传统宗教信仰并未完全消失，鲁巴里信仰在乌干达南部乡村仍然存在，偶尔可见传统的神庙。根据其它信息来源，乌干达还有巴哈伊19000到105000人，犹太人1100人，以及少量摩门教徒。

因此，乌干达公民几乎人人信教，宗教热情很高，他们很难理解像我这样不信教的无神论者。与当地人的交往中，直爽的乌干达人经常对我这个异乡客提问：你研究宗教，那么你信仰什么宗教？起初我总是脱口而出：我是唯物主义者，不信仰任何宗教。他们大为惊讶，瞬间会瞪大眼睛看着我，友好的气氛顿时陷入尴尬，后面的交流往往也就不甚理想。我理解他们的宗教情结，但他们通常不理解我的“无神论情节”。后来为了缓和气氛，再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就变通一下，声明信仰中国传统宗教，儒教或者道教，或者回答我还未决定信仰何种宗教。问题随之而来，对方总是要求我解释何为儒教和道教，或者积极向我游说，希望我能信仰他们的宗教。这令我不胜其烦，更重要的是，违心地回答问题让我非常压抑。



我决定以后仍坚定的回答我不信仰宗教。于是我不得不经常与他们辩论信教与不信教的问题。甚至有一次我到家具市场买桌子，面对店员咄咄逼人的架势，简直把我这个不信教的中国人等同于“异类”，我被迫自卫。我们几乎吵得面红耳赤，差点连交易都未做成。

在乌干达的城市和乡村，宗教活动场所随处可见。乡村的许多基督教堂与清真寺都破烂不堪，即使如此它们很可能也是当地最好的建筑。城市中的宗教建筑要气派得多，最好的教堂多由西方教会援建，漂亮的清真寺则多由中东伊斯兰国家资助。在首都坎帕拉北郊的一座小山上，一座圆形的巴哈伊教圣殿耸然而立，圣殿占地50英亩，1961年建成。这座被巴哈伊称为“非洲圣殿之母”的灵曦堂，几乎在坎帕拉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见。随着印度商业在乌干达的发展，印度教神庙也在乌干达的城市中不断出现。由于印度商人比较富裕，他们的神庙也建得气势磅

礴，在首都坎帕拉和第二大城市金贾，印度教神庙都已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

乌干达人的传教热情很高。有一次，我到金贾市公安局了解宗教方面的信息，碰到一位部门长官，他是基督教徒。谈完工作之后，他热情地向我传教，希望我能成为基督教徒。我只好婉拒，称今天有事，以后再谈，他竟然一本正经地跟我约定下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在乌干达，经常碰到大街上有人旁若无人地高声向路人宣教，或者在公交车上，当旅客昏昏欲睡时，有人站起来滔滔不绝地向车上乘客宣教。我甚至在金贾市的大街上看一位摩门教徒，像中国的算命先生一样设摊传教。

在乌干达，宗教性的非政府组织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各种宗教及教派都有全国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各个行政区，也有相应的分支机构，而且绝大多数慈善机构、教育机构、基金会等都有宗教背景。除常设性的宗教性非政府机构外，还有许多临时性的宗

教组织。这些宗教组织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国外，一般是从国际上争取一笔经费，就可成立一个组织，或者为争取经费支持而成立非政府组织。一旦资金枯竭，这种组织即自行解散。但其它类似组织则会相继出现，连绵不绝。这些宗教组织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有慈善性的、教育性的，还有文艺性的歌舞类娱乐活动。慈善性宗教组织主要围绕预防与治疗艾滋病、疟疾等非洲流行疾病开展工作，或者从事减灾、扶贫等活动。一些资金充足的宗教性非政府组织，还有自己的广播电台，用英语和当地语言广播。

乌干达的教育有强烈地宗教色彩和宗教背景。学校分私立与公立两类。私立学校大多为宗教组织或以宗教组织为背景的慈善机构所设立，以伊斯兰教组织和基督宗教组织为主，附属某种宗教组织的私立学校，一般只提供该组织自己的宗教教育。私立学校向所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开放，在乌干达，穆斯林学生进基督宗教组织开设的私立学校非常普遍，反之亦然。公立学校中是否开设宗教科目由学校决定，实际上公立学校大多开设宗教课程。但是公立学校不能只开设某一宗教的相关宗教科目，而应开设世界宗教科目，以体现公立性和中立性。在学校里看到宣传宗教的标语、口号之类的文字，司空见惯。

在乌干达的东部城市蒙巴利，有一座闻名东非的伊斯兰大学。学校建立于1971年，由伊斯兰会议组织出资运作，面向东非和南非地区说英语的穆斯林招生，为东非和南非国家的穆斯林社区培养宗教人才。学校设有法学院、科学学院、教育学院、管理学院、艺术与社会学院、阿拉伯-伊斯兰研究院、计算机学院和研究生院，除计算机学院外，基本上开设的是伊斯兰教课程。此外，该校还在坎帕拉等城市设有分校。

在乌干达，许多宗教节日为国家法定节

假日，如宰牲节，开斋节，耶稣受难节，复活节，圣诞节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国浓郁的宗教气氛。

三、宗教与政治：“分”中有“合”

乌干达自成立以来，宪法就给予公民宗教自由的权利。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可以有信教与宣教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我在乌干达期间，经常碰到穆斯林改信基督宗教，或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任何宗教组织、政府和家庭都无权干预个人的改宗行为。政教分离已是乌干达基本的立国原则，政府公职人员中有各种宗教的信徒。宗教组织也不得干预政治。乌干达的政教关系比较融洽。本着宗教自由的原则，乌干达政府中没有专门管理宗教的部门。

不过，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原则，并不意味着宗教与政治不存在任何联系。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仍在乌干达社会生活中各领域有所表现。乌干达的国徽上写着这样一行字：“为了上帝和祖国”（FOR GOD AND MY COUNTRY），这说明乌干达人不但将工作与祖国建立因果关系，还是为了上帝而努力。政府必须要处理好与各宗教之间的关系，尤其自2005年自由选举政治后，宗教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选票。在宗教氛围如此浓厚的国家，政治与宗教有着微妙的联系。每逢宗教上的重大事项，如宗教上的庆祝或纪念活动、外国主教来访等，现任总统穆塞韦尼都要以总统身份到场。事实上，乌干达许多政治力量都有或多或少的宗教背景，即使曾经盘踞乌北部达20年之久的反政府武装“圣灵抵抗军”也有着浓重的宗教色彩。“圣灵抵抗军”的首领约瑟夫·科尼声称，他是上帝的代言人和神灵的中介，他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神权国家。

1971—1979年，时任乌干达总统的艾



作者参加乌干达传统婚礼

迪·阿明是位穆斯林。1972年，阿明宣布乌干达为伊斯兰国家，在国内驱逐印度人，迫害国内其他非穆斯林族裔，在国际上与伊斯兰国家结盟。他旨在以宗教为借口掠夺印度人的资产，争取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援助。这是乌干达一例典型的宗教—政治迫害事件，它说明在乌干达宗教仍可以被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之中。

虽然乌政府未设管理宗教的专门机构，但是政府仍对宗教事务实行“隐性管理”。内务部、道德委员会等政府机构承担着管理宗教事务的职能。国内所有的宗教组织必须向政府部门登记，不登记者视为刑事犯罪，将面临罚款，甚至可能被投入监狱。乌干达

各宗教间为了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成立一个名为“宗教间关系委员会”的机构，就共同关心的话题提交给该机构讨论。这是一个非政府性质的组织，但却由乌干达总统委员会领导，显示出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权。

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同时，宗教力量也对政府行为有很大的约束作用。2004年9月，乌政府税务部门规定，将对宗教组织的

每年的资金结余进行征税，遭到宗教领袖们的联合反对，最终此规定未能实施。2008年7月，乌干达法律委员会向议会提交了修改后的《家庭关系法》，希望能够修改实施。但是穆斯林组织认为这部法律违反伊斯兰教法，是对穆斯林权利的侵犯，纷纷表示反对，导致法律未能通过。至今多妻制在乌干达仍为合法婚姻。

世界的宗教文化丰富多样，乌干达这颗“非洲明珠”也同样折射出宗教文化的丰富多彩。宗教仍是绝大多数乌干达国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种宗教如何和谐并存，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各领域的关系，仍在考验着这个非洲国家的当政者。